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河北方言

李巧兰/著

中的儿化变音研究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河北方言 中的儿化变音研究

李巧兰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研究 / 李巧兰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202-06052-0

I. ①河… II. ①李… III. ①北方方言—儿化—方言研究—河北省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214号

书 名 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研究

著 者 李巧兰

责任编辑 王 颖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荣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8 000

印 数 1-3 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052-0/H·3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普通话中的儿化绝大部分来自古代的词缀“-儿”，但也有少数其他来源的成分，如“日”（今儿）、“里”（这儿）。而北方方言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一方面，存在着不读儿化，而是独成音节的“-儿”词缀（如河北保定一带）；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虚词也加入到了儿化的行列，如动词后加动态助词“了”时也读儿化（如河北东部、山东烟台等地）。这样，儿化与“-儿”缀、“-儿”缀与非“-儿”缀来源的儿化，便纠结在一起。为了对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本书统称之为儿化变音，不失为一种简便实用的做法。

儿化变音的各种形式，实际上是语音变化与语法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方言间的不同形式则是各地发展不同步的结果，因而对此进行共时描写和历时溯源相结合的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就共时来说，可以描写、比较各地方言与方言之间、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在这个方面的差异；就历时来说，追溯各种儿化的来源，揭示其形成机制和变化规律，可以为汉语“儿”音的演变、儿化的演变以及汉语语法化一些环节的演变提供重要参考。河北方言中，儿化语音形式复杂多样，在意义和语法上也很有特点。本书以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为研究对象，从共时的调查、描写入手，进而探讨各种语音形式的来源与演变过程，分析语义与语法特点及其形成机制，这对河北方言研究的深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方言的相关课题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本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儿”音的研究文献和河北方言的研究文献资料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因而能够在前贤时修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者对于与选题有关的历史语言学、音系学、语法化以及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也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因而能够综合利

用相关理论多方面地深入挖掘方言现象背后的各方面因素与内涵。

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获:

一、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调查了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的各种形式,并对此加以细致的分类,从而向人们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河北方言儿化变音的全面资料。其中有些类型是新发现的。

二、对河北方言不同的儿化变音形式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并参考古代语音文献,对河北方言中“儿”音的演变过程以及儿化变音不同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对前人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修正和细化的意见,揭示了不同儿化变音形式所反映的不同历史层次。

三、在对河北方言中“儿”尾的语义特征进行描写的基础上,考察古代文献资料,分析了其语法化的过程。

四、对河北方言中非“儿”尾来源的儿化变音进行了语法特点的描写,并考察了它们的不同来源。

五、运用非线性音系学理论对“儿”的各种音变形式进行了特征几何分析,从而比较具体、细致、合理地解释了音变的机理。

总的来看,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利用多方面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共时描写现状与历时追溯源流相结合,河北方言的研究与其他汉语方言的比较相结合,分析变化过程与探讨变化机理相结合,是一部资料厚实、分析全面,达到相当深度的学术著作。

作为本书作者的博士指导教师,也是本书书稿的第一个读者,我自然知道作者在调查和查阅资料中的艰辛,知道作者为本课题进行的苦苦思索和不懈努力,也很欣喜地看到了书稿一步步的成熟过程。博士论文得到了评阅专家以及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评价,并顺利通过答辩,就是对作者三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现在,本书正式出版,可以进一步发挥其在相关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以推动下一步的研究,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汉语方言中儿化变音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希望作者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力求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考察汉语儿化变音的相关问题。

张树铮

2011年8月于济南山东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河北方言概况	(1)
第二节 儿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2)
第三节 本课题的意义、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和运用的方法	(6)
第四节 语料来源和方言代表点选取原则及情况简介	(11)
第五节 文中术语、符号和常用概念的界定	(13)
第二章 河北方言中的“儿”和儿化变音	(15)
第一节 河北省150个县市方言中“儿”的读音	(16)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的类型及其地域分布	(17)
第三节 河北方言中11个方言代表点的儿化变音的语音情况	(37)
第三章 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的特点、成因及特征几何诠释	(78)
第一节 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的特点	(78)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中共时平面“X-儿”语音形式类型复杂性成因探讨	(114)
第三节 河北方言中“X-儿”语音形式共时平面类型的特征几何诠释	(122)

第四章 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发展的历时过程及其相关问题·····	(128)
第一节 河北方言中与儿化变音的语音演变过程相关的问题·····	(128)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历时发展的大致过程及时间·····	(146)
第三节 河北方言中“X-儿”语音演变的时代问题·····	(157)
第五章 从词汇化、语法化视角看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	(162)
第一节 儿化变音的语义内涵·····	(162)
第二节 从词汇化、语法化角度看儿化词的形成和发展·····	(194)
第三节 儿化变音的形成动因及演变模式·····	(211)
附录1: 方言调查人情况·····	(220)
附录2: 调查所用词语表·····	(229)
附录3: 语法例句调查表·····	(230)
附录4: 150个县市基本韵母与儿化韵母的对应关系表 ·····	(232)
参考文献 ·····	(304)
后记 ·····	(31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河北方言概况

河北省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北邻内蒙古，东接辽宁，南接河南、山东，西靠山西，而将北京和天津包围于内（天津原属河北省）。

河北方言属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内部的方言情况也较为复杂。河北方言的形成与其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从地理上看，冀鲁官话与晋语的界限主要是自然地理形成的。在河北省的地形图上，大致来说，太行山的东缘、海拔200米以下的绿色地带就是冀鲁官话区，其上就是晋语区，只有冀南的邯郸和邢台之南是晋语向平原地区伸出的一个触角，这些县市的方言或多或少地带有晋语的特点，再加上这些县市的部分地区处于山区，历来交通不便，与外界的交流联系较少，所以这些方言受外界方言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少。北京以西的蔚县、涞源尽管地势较高而仍属冀鲁官话，但它处于晋语和冀鲁官话的过渡区域，所以它的方言内部有一定的差异，东部和西部有所不同。太行山以北的冀西北地区也属晋语区。冀东北冀鲁官话与北京官话的界限也主要与地形有关：遵化、迁西等地处长城以北的山区属于北京官话区，而以南属于冀鲁官话区。至于冀鲁官话与东北话以山海关为界则既与地理有关，也与行政区划有关。（张树铮，2006）

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河北省的方言大部分属于官话方言，而其中又分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北京官话；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晋语的方言。属于冀鲁官话的有106个县市，分属保唐片、石济片和沧惠片三个大片，三个大片下又可细分为10个小片；属于晋语的有35个县市，它们分属于张呼片和邯新片；属于北京官话的有13个县市，它们属于怀承片；属于中原官话郑曹片的有2个县市。150个县市（一县分属两片的按一个县市计算）

的方言分区情况见本章末所附图1。

从地理上看,晋语分布在河北省的西北部及西部边缘的太行山区,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市周围及北部山区,属中原官话的只有靠近河南的两个县,还有部分县市处于几种方言的过渡地带。它们的东部与西部有差异,比如曲周县东里疃以西是晋语,而东里疃以东是冀鲁官话;广平城关以西为晋语,以东为冀鲁官话;魏县棘针寨以西为晋语,以东是中原官话;临城城关以西为晋语,以东是冀鲁官话;内丘城关以西是晋语,以东是冀鲁官话;邢台县西部地区是晋语,东部地区是冀鲁官话。正如袁家骅先生所说:“方言的过渡地带,好像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袁家骅,1983)

第二节 儿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儿化变音现象,由于方言的不同和语音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方言处于儿化化合阶段,而有的方言还处于儿尾阶段。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前人关于儿化变音的研究,用的术语往往不同,在普通话中人们称其为“儿化”,在方言中有“儿化”与“儿尾”等不同术语。

以往对“儿化”变音现象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可以大致分成两部分:对普通话中“儿化”现象的研究和对方言中“儿化”现象的研究。若从时间平面来看,则又可以分为:对“儿化”现象的描写研究和对儿化历时演变的研究。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其分成三部分:普通话的儿化现象研究、方言儿化现象研究和对儿化演变的研究来分别加以叙述。

一、关于普通话中“儿化”现象的研究

在普通话中,儿化变音从其读音形式来看,表现为儿化韵的形式,所以在普通话中或者说在北京语音系统中,关于儿化变音的研究实际表现为对“儿化”的研究。“儿化”是现代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对普通话中“儿化”进行研究的人很多,有关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也有很多,但由于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对象不同,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化”的性质问题

关于“儿化”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以下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儿化”

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如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首先给官话语音系统加了一个-r韵尾,说“官话里只有n, ng和r这几个韵尾”,并在“卷舌韵尾的形态音位”一节提出了“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认为“从现代北京话的角度看,‘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把‘儿’看作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构词后缀语素当然也就不恰当了”。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王理嘉《音系学基础》等,也把卷舌元音中的卷舌成分-r离析出来,把“儿化”放在语音层面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儿化”是一种语法语素,应放在语法层面处理,如劲松《“儿化”的语素形位学研究》认为“儿化”现象是“儿”作为一个语法语素在语流中的不同语音变化形式,从语素形位学的角度来说,“儿”是一个形位,是一个语法语素在语流音变中形成的功能聚合单位。

(二) 儿化词中“儿”的语素地位问题

“儿”是否是语素成分?如果是,是何性质的语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语法讲义》及许多通行的现代汉语语法教材等都将“儿”与“子”“头”等词缀语素并称,同等看待。李思敬《汉语儿[ɐ]音史研究》认为“儿”是词尾。而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和宋玉柱《关于“儿”的语法性质》则认为“儿”有两个:一个是构词成分,即词缀;一个是构形成分,即形素。刘雪春《儿化的语言性质》认为“儿”是语素,但一个是词缀,一个是词尾。劲松在《“儿化”的语素形位学研究》中认为“儿”是一个形位,是一个语法语素在语流中形成的功能聚合单位。张树铮《论普通话-儿缀的语音形式》认为“儿”是以语音特征[+卷舌]为语音形式的独立的后缀。

葛本仪、李立成等则否定“儿”作为词缀语素的资格。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认为词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音节作为自己的语音形式,而“儿化”中只能是在一个音节中发生的音变现象。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也认为“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李延瑞在《论普通话儿化韵及儿化音位》中认为:不应该把儿化韵看成是“儿”语素音位,也不必再对儿化音节进行语素分析了。

(三) 对“儿化韵”的处理问题

普通话中由于儿化而形成的“儿化韵”,它的性质如何?有人认为儿化音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如李思敬《汉语儿[ɐ]音史研究》和各种现代汉语教材都持这种观点,所以李思敬认为“前人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儿化韵母全可

以归纳在{ɔ}形态音位的五个变体之中”；也有人认为“儿化”不同于纯粹的音变，它应属于变音现象，变音不是纯语音的过程，如徐通锵《音节的音义关联和汉语的变音》，反对用语素音位的方法去处理儿化韵。

二、对方言中“儿化”“儿尾”现象的研究

方言中对儿化变音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也有不少，有对方言中“儿化”和“儿尾”现象的语音分析，还有对其表义和功能的详细描写。我们查阅有关资料，这方面的论文不下百篇，在此我们略举些例子，如《温州方言的儿尾》《温州方言儿尾的语音变化》（郑张尚芳，1979，1980），《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徐通锵，1981、1985），《山东金乡话儿化对声母的影响》（马凤如，1984），《阳谷方言的儿化》（董绍克，1985），《浙江义乌方言里的儿化韵》（方松熹，1986），《杭州方言里儿尾的发音》（史瑞明，1989），《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颜森，1989），《湖南安乡方言的儿化》（应雨田，1990），《鄂州方言的儿化》（万幼斌，1990），《宜昌儿化现象初探》（胡海，1994），《临夏方言的儿化音变》（王森，1995），《山东寿光北部方言的儿化》、《淄博等地方言的儿化变韵与幼儿型儿化》（张树铮，1996、1999），《重庆方言儿化音刍议》（汪长学，1996），《镇龙方言儿尾》（向道华，1998）《武汉话中的类儿化音变》（吴振国，1999），《团风方言的儿尾》（汪化云，1999），《河北迁西方言的儿化》（江海燕，2000），《唐山方言动词儿化及其动态变化》（张文光，2000），《北京话儿化成分的语义特点及语素身份》（王立，2001），《临澧方言的儿尾和儿化》（赵冬梅，2002），《论常德方言的儿化现象》（丁志丛，2002），《山东安丘方言的儿化》（赵光智，2002），《遵义方言儿化的作用与分布》（胡光斌，2003），《太原话儿尾使用情况分析》（王文卿，2004）《商丘方言的儿化音变》（谢书民，2004）《山西定襄方言名词的里变儿化》（范慧琴，2004），等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以某方言点作为研究的对象，对其“儿化”或“儿尾”进行语音、表义和语法功能上的描写。另外也有一些是以某方言区为对象，对其中各方言代表点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如《浙江吴方言里的儿尾》（方松熹，1993）、《晋语的儿尾变调和儿化变调》（蒋平、沈明，2002），这方面的文章较少。还有一些专著中

对儿化和儿尾有关内容有所涉及，如张树铮先生《方言历史探索》、王福堂先生《方言演变的历史和层次》、钱曾怡先生《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著作中的有关章节，综合了不同方言的情况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对“儿化”演变历史的研究

关于“儿化”的演变史，一方面是关于“儿”字本身的演变史的研究，如：《儿[ɐ]音的演变》（唐虞，1932）、《汉语儿[ɐ]音史研究》（李思敬，1986）、《古汉语里儿字用法概说》（徐海英，1993）、《从元史译名看“儿”[ɐ]音问题》（张清常，1993）；另一方面是关于“儿化韵”形成和演变的研究，目前所见这方面的文章不是很多，但有一些，有的是以普通话为对象的，有的是以方言为对象的，如《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李思敬，1984）、《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赵杰，1996）、《汉语儿化音的发生和发展》（季永海，1999）、《略论汉语方言儿化韵的历史演变》（颜峰，2002）等。

就某一单点方言进行分析研究，很容易流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解释，要想进一步探究其根源，或给其定性，就必须将其置于所属的大语言环境之中，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共时与历时两个平面对其做全面的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在官话方言中，儿化变音无论从语音上看，还是从语义、语法上看，它的情况都很复杂，我们如果把多方言点放在一起，再把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结合在一起考察，同时从其历时演变过程着眼，就会发现，原来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它们却有着很深的联系。如：Z变韵、D变韵、儿化韵、小称变韵。它们看似无关，其实从它们的性质看，它们都属于非本源性的派生音，只是它与本源音的对应规律不是语音条件，而是特定的语法意义；而原来看似一类的现象，其实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儿化”它本身的复杂性，是由其多源性决定的。方言中（包括普通话）儿化变音只是一种同形结构，实际上它有不同的来源，所以表现在意义、语法功能上、语音形式上很复杂。我们可以据其历史来源和语法、语义的一致性，将其分成两部分：儿来源与非儿来源的儿化变音。其中儿来源的儿化变音与“小称变韵”“小称音变”“小称变调”属于“儿”语素与前一音节结合在不同方言音变的不同情况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非儿来源的部分儿化变音与“D变韵”中的一部分是同一情况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中的“儿”源于助词“着、了、得、到”等；还有一部分非儿来源的儿化变音中的“儿”是历史上“里、日”等音变的结果。据此，我们将对河北方言中儿化变

音的语音、语义与语法做一全面的分析。

第三节 本课题的意义、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和运用的方法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河北方言的独特意义

河北方言的独特地位和复杂情况，决定了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材料，首先因为它是汉语方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官话方言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其次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与普通话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它进行研究可以为更好地研究普通话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对河北方言进行研究，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语音整齐有规律的地域分布，是语音演变和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从发生学上，还是从类型学上来讲，共时地域分布差异有可能反映某项语音特征的历时演变过程，差异类型越丰富，历时过程越清晰。正如钱曾怡先生所说“方言特点的地域差异往往是语言发展历史的投影”（钱曾怡，2002），所以我们选择情况复杂的河北方言进行研究，对于研究语言的发展历史意义尤其重要。

以往对河北方言的研究做得还不充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河北方言的某些方面在调查、描写、研究上还处于空白的状态，比如对于河北方言中的儿化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描写的论著，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更不用说对其演变史的研究了。因此，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描写就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由于近年来推普工作力度的加大，河北方言中的某些现象正处在变化或消失的过程中。如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读音，在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口中就有很大不同，在河北的部分县市老年人的口语中读[ʅ]、[ʅə]、[əʅ]等，而在中青年人中都已经与普通话相同，因此，记录和分析这些现象具有“抢救”的意义。在对于河北方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材料不足给比较研究带来的困难，这越发使我们觉得，对现有方言进行较细致的研究，哪怕只是专项研究，都是很必要的。

（二）当今方言研究的大背景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和语料入手。描写方言

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系，说明该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特点。随着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简单地共时描写，而是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拓展自己的领域。近20年来，方言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不仅对某种方言作更为细致和详尽的描写，同时注意描写与解释相结合，而且注重与邻近的方言比较，研究方言发展的历史和层次，或者结合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方法对方言现象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来审视以往对儿化变音的研究，会发现它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儿化变音研究中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关于“儿化”的研究，虽然文章很多，有对共同语的研究，也有对方言的研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 共时平面上，方言与共同语的结合做得不够。

对共同语中“儿化”的研究争议颇多，如：对“儿化”的性质判断意见不同，对儿化韵的描写存在分歧，对其表义功能也有争论。而方言关于“儿化”“儿尾”研究的文章，又多是对某方言点的单一研究，很少与共同语结合起来研究。方言与共同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作为其基础方言的北方官话，对方言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共同语的特点和现有现象的成因。

2. 方言中关于孤立方言点的描写多，而整体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以往对方言中的儿尾、儿化研究，单从前述文章的题目来看，就可以看到关于孤立方言点的描写多，而整体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方言是同一语言的地域变异，所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拿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作比较，便应该是方言学的基本方法。儿尾、儿化在同类方言中既有其共性，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只有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才能把握其特点，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3. 语音的研究居多，有时兼顾语义，将语音、语义、语法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少。

以往的研究注重对“儿化”语音的单面研究，而对与其关系密切的语义、语法的关注较少。人们对其研究多为儿化合音过程的分析，儿化音节面貌的描写，对其表义情况和其语法作用则只限于简单的判断，很少把其语音、语义和语法三方面结合起来分析。

4. 关于“儿化”发展史的研究，共时和历时结合得不够。

以往的研究也有对其形成、发展的探讨，如《古汉语里儿字用法概说》（徐海英，1993）、《略论汉语方言儿化韵的历史演变》（颜峰，2002）、《汉语儿[ɐ]音史研究》（李思敬，1986）、《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李思敬，1984）等，仅是对“儿化”或“儿音”历史文献地处理或者单纯地进行方言描写，而没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使其相互印证。

（四）儿化变音不同于儿化音变

儿化变音是一种与意义有直接关联的语音单位，它的分布是不自由的、可以预测的，它只分布在特定的语法意义中（王洪君，1999）。它的音变不同于语气词的变读等纯语音音变现象，我们在分析时必须将其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做出判断。

儿化变音形式在方言中不同的语音表现，是不同历史阶段音变的积淀，而同一方言中“儿尾”与“儿化”共存的现象，更是一种“异时演变的叠置”现象，在共时平面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如语义和语法功能的差异，尤其是语音的差异，都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必然受到语音演变规律的制约，而又不同于诸如连读变调等单纯的音变现象，它和一定的语义和语法功能相关联。过去人们多以语音的线性结构为基础，来解释语音的演变，往往只注意到“音变规律无例外”，偏重于对“死”的文献材料的分析，忽略对现有方言“活”语料的利用，难以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必须把各种语料结合起来综合运用，使其相互补充，克服其局限性，才能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主要方法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我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语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序异质系统，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的方言是语言不同发展阶段在空间上体现，而且语言系统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几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我们在论述的过程中要运用语音、语义和语法演变的一些相关理论，运用异质—推移—扩散这一理论模式来对儿化变音的语音演变过程加以分析。

1. 语音渐变理论

新语法学派以“语音规律无例外”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他们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渐变的和连续的。语音的渐变性是语

音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新语法学派强调这一点，也是对历史语言学的一大贡献。同时他们用类推来解释例外的音变，虽然有一些例外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但是也在大量例外不能解释。语音渐变理论仅仅是音变方式中的一种，它只适用于解释部分音变现象，而对由于语言的接触如词语的借入而导致的音变则无能为力。

2. 词汇扩散理论

词汇扩散理论是王士元在《竞争的变化是造成剩余的原因》一文中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语音的变化是突变的，而在词汇上的扩散却是渐变的。词汇扩散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拉波夫的波浪理论和齐列龙的“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理论，它是对“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反动。近年来词汇扩散理论已在数种语言研究中应用，而且在深度上得到了强化，如开展双向扩散、扩散速率、地域分布扩散和句法演变的扩散研究。词汇扩散理论较之语音渐变理论，更加注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语音演变的动态演变过程，更有利于解释语音演变的例外。1980年代以来，词汇扩散理论拓展了语言的微观过程研究，往往能描绘出语音发展的生动过程，甚至于能勾勒出音变的时间、空间曲线图。音变是不平衡的，速度有快有慢，词汇扩散理论的三阶段：未变阶段、正在变化阶段、已变阶段，对语音变化研究很有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词汇扩散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它只能用来解释音类的变化。语音渐变理论和词汇扩散理论，它们“并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张树铮，2005）。

3. 叠置式音变理论

叠置式音变理论是徐通锵先生在认真研究了各种音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一种语言演变理论。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对前代语音材料和语音规律的继承，也有外来音系对本地音系的影响造成的变异，所以从一个断代的共时语音系统看，它都是一个叠置的语音系统。不同时代的语音特点共存于一个系统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共时系统时，要运用叠置式音变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认为不仅是语音，语法系统同样是一个叠置系统，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有不同来源的语法形式，它们以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而共存于共时系统之中，这同样可以称为叠置现象。

4. 非线性音系学的有关理论

非线性音系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的诸多音系新理论的总称，

标志着美国音系理论的第三次高潮。它不同于自立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把音流的结构看作是单线性的,而是认为表面上看在时间的一维向度上延续的音流,有多层次、多条的线性配列限制,不同列的线性结构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除此之外,它还“主张音系和语法是相对独立但彼此有关联的层面,音系单位和音系规则的确定和施用也应考虑语法语义的因素”(王洪君,1999)。汉语音节结构不同于印欧语系,“音节的音义关联是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音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这种关联为基础形成的音节在语言运转中音与义相互制约,灵活多变,使结构单位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变异。变音就是这种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徐通锵,2003)。所以我们在分析儿化变音时,非线性音系学的有关理论会对我们多有启示。

5. 语法化理论

近些年来,西方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理论的研究颇为重视,成果不断问世。对于汉语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来说,语法化现象的理论探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考察汉语的发展历史,虚词一般是由实词转变来的。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词汇语法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在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过程中,一个实词的语法化通常是发生在它的某个义位上,语法化的结果是该词在某个义位上独立或分离出某个虚词。至于这个词的其他义位则仍按实词功能继续使用,不会因为源于某个义位的虚词产生而导致该实词消失。对于儿化变音形式中的“儿”语素,语义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我们用语法化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二) 研究的主要方法

1. 田野调查、多种语料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的语料来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田野调查所得,另一部分采用前人时贤的有关成果。为了获取翔实、可靠的材料,我们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法,对河北境内150个县市区进行全面调查,在实际调查的过程中获得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所要借鉴的前人时贤的有关成果,进行核实、补充。在探讨儿化变音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将采用多种语料相结合的方法,将方言语料与历史文献语料互相印证,以使我们的论述更加扎实、准确。